

專業期刊與民國新史學*

——以二三十年代學術的發表行為為中心

◎ 王建偉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專業史學期刊的興起，是現代史學制度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史學期刊這一形式出現的本身就是史學現代轉型中的重要元素，顯示出史學研究較之以往所出現的新的起點與重大轉向，新興的學術發表行為更是改變了民國史學研究的整體形態。正是這種改變使得史學研究逐漸走向學院化、專業化，復歸其純粹的學術本色，而史學自身與時代的疏離也愈加明顯。

一 二十年代末期專業史學期刊開始興起

學術期刊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學報。早在1895年，由陳虬主持，浙江利濟醫院學堂籌辦了《利濟學堂報》，被認為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份校刊」。¹這份校刊雖然已經具備了現代學術期刊的一些基本形式，但仍屬綜合性雜誌，所刊內容龐雜，並非專業性的學術期刊。

專業史學期刊的興起是伴隨學術機構的出現而出現的。大學史學系與專業史學研究機構紛紛設立之後，公開討論的學術風氣漸漸濃厚，至1920年代，史學學會開始在高校出現並日趨活躍。如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學會於1920年宣告成立，1920年5月，南高文史地部學生成立了史地研究會，北京大學史學會成立於1922年，1927年5月12日，清華大學史學會成立，1929年，燕京大學歷史學會成立。這些學會都辦起了自己的學術期刊作為發表研究成果的園地，以期聯絡同仁、交換學術心得。

學術性的史學期刊最初是以史學與地理學結合的方式出現的，史學與地理學常合為一刊，如北京高師史地學會主辦的《史地叢刊》（1920年）、南高史地研究會的《史地學報》（1921年）、中國史地學會的《史學與地學》（1926年）等。這種現象緣於史地之間的重要關聯，當時史地二學常常並稱，兩者似乎不分，許多高校也是以史地結合的形式設系。

歷史學和語言學在20年代中後期也常常合稱，典型的如傅斯年負責籌辦的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兩個機構的機關刊物《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有前後相繼之處。尤其是後者的創辦，更是民國史學的標誌性實踐，它是當時史界風氣與研究水準的最集中體現。

同一時期，大量的史學論文也發表於以「國學」命名的刊物，如北大國學門的《國學季刊》²（1923年），清華國學院的《國學論叢》（1927年）等，史學的篇幅在其中佔據了極大

的分量。從胡適在著名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所列舉的國學研究中的十個方面來看，當時國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就是史學。³

專門以史學為內容的期刊出現在1920年代末期，同在1929年發行的《史學雜誌》（南京中國史學會）、《史學年報》（燕京大學史學會）和《成大史學雜誌》（成都大學史學研究會）是現今所見最早的專門性史學期刊。至少在外在形式上，此時的史學逐漸與地理學，語言學劃清了界限，並逐漸從國學中分離出來，史學的獨立化趨勢加快。

30年代中期，以《禹貢》、《食貨》為代表的更加專門的期刊出現，這些期刊已經突破了把史學作為一個整體看待的觀念，史學內部的一些學科次領域已經憑藉特定期刊有了比較明顯的邊界意識，一些學術群體也開始以期刊為陣地有了最初的聚集。如歷史地理學、中國社會經濟史等新興學術研究領域就是在此基礎之上衍生，史學的分工更加細密。

專門性史學期刊興起之後，一些綜合性高校的學報，如《清華學報》、《燕京學報》等，刊布的論文中史學一類所佔比重仍然為最大。這種情況從一方面反映了民國時期的整體學術生態，同時也反映了史學在走向獨立化進程中的複雜性。

1949年，齊思和在回顧清末至民國的史學發展時提到了二三十年代許多著名的史學期刊，並認為「我們史學的拓荒工作，多半首先在這裏發表，這裏面實蘊藏著近三十年中國史學研究的大部成績。」⁴而張春樹則將民國史學期刊的貢獻概括為四點：第一，擴大國史研究之領域與資料之範圍；第二，開拓歷史解釋之架構與範疇；第三，加深史學分析之角度與幅度；第四，養成眾多之具高度史才、史學、史識並多具科學分析方法之青年史學家。總的成果就是引導中國之史學研究進入新境界，打下新基礎。⁵可見史學期刊對於現代中國史學影響的深遠程度要超過我們既往的認知。

二 史學期刊與學術發表

學術的發表，是現代學術建制中的重要一環。但在沒有學術期刊的時代，學人們憑藉什麼而相互論學？「書信，尤其是論學的書信，在沒有『學報』的時代，每每帶有學報的功能，用來流通自己的發現或新見解。」⁶艾爾曼也論述了18世紀前後，私人通信會晤在江南考據學這個學術共同體中的學術交流的重要作用。他引用一位叫奧澤·瓦萊的話，認為18世紀還沒有學術期刊。學術同行之間的書信交流彌補了這一缺憾，袁枚等許多學者把書信當作一種進行某些不宜以專著或論文形式發表的臨時性研究的方式。後來，人們把學術信件收集起來，或編入作者的文集，或單獨成集出版。而且當時，各種信件文稿常為朋友傳抄，甚至交給他人閱讀、討論。章學誠就採用這種方式宣傳自己的主張。錢大昕也常以通信方式委婉地指出同行、朋友出現的學術失誤。⁷

專業期刊興起之後，私人間論學的通信也開始刊登在公開發行的期刊中，學人間私下的討論延展到了學人們普遍的公共視野之內。1922年，柳詒徵在其主編的《史地學報》上發表文章，抨擊章太炎「詆訶孔子」，是「誣衊古代聖賢」，「坐儒家以萬惡之名，不知是何心肝也」。章致信於柳進行答覆，柳將此信以〈致柳翼謀書〉為名，刊登在《史地學報》第二卷第三期上。⁸最典型的例子是顧頡剛與錢玄同的通信。顧將與錢的通信以《答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發表在《努力》週報的學術副刊《讀書雜誌》上，引發了轟轟烈烈的古史辨大討論，深刻影響了現代史學的發展。

學術的發表行為使現代學者從事研究的過程產生了根本變異，改變了學者獲取資訊及其撰述的方式。大部分學者的論著，皆先揭櫫報刊雜誌上，其後或經修補增刪，收入文集再出版。而且，學人們在廣泛披覽報刊雜誌之後，就進入一個與並世學者發生緊密互動的交流空間，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在受人影響、與人論辯的過程中，一面形成、修正自己的觀點，一面補充、駁正他人的說法。⁹當譚其驤對《禹貢》的編輯工作提出質疑，認為浪費自己時間時，顧頡剛就認為：「現在研究學問已不是一個目不窺園可以獨立城就的，分工合作乃是避免不了的方式。你要一個人編一部『中國地理沿革史』，而實際上是無數個人幫著你的。一個人精神有限，對於一種學問，無論怎樣用心，總有看不到的材料，想不到的問題。幾個人一起討論，就都看到了，想到了。你說你不贊成編《禹貢》，試問你將來編纂『沿革史』時能否不看《禹貢》？」¹⁰同時，文章通過發表，作者的觀點能夠在學術圈內被更多的人接觸，並引起公開討論與評價，對於文章本身也是不斷修訂、不斷再創作的過程，「因此從這個層面來看，在期刊上發表文章，或是出版學術撰著，皆可視為是現代學術型塑客觀價值的重要活動。」¹¹

文章的發表使一種學術成果或者學術觀點能夠更快的傳播，使一種成果被更多的學人分享。遠在浙江的夏承燾可以看到北平出版的《國學季刊》與《燕京學報》，且不時撰寫呼應文字以為討論。¹²而錢穆回憶，他在北平舊書肆購得顧祖禹嘉慶刊本的《讀史方輿紀要》之前八卷，為此寫作一文刊於《禹貢》。浙江興業銀行行長葉景揆曾為此文專門拜訪。他發表於《燕京學報》的《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曾獲歐洲某漢學家來函推崇，這位漢學家認為讀過此文後，「乃知中國學術問題需由中國人自加論定，非異邦人所能為力也。」而且胡適在與顧頡剛討論老子年代時，也提及了此文。¹³可以說，「機關刊物已經成為20世紀學人發表研究心得，交換學術資訊的主要場域。」¹⁴

年輕人是期刊興起的最大獲益者，正是期刊為年輕人在畢業之後繼續學習提供了巨大的機會。1935年10月23日，顧頡剛致傅斯年信為禹貢學會經費求援時又言及：「弟之經驗，一個大學畢業生，如果四五年中不做學問工作，他的一生就不能再做這個工作了。研究院的用處，就在大學畢業後能再與他一個讀書的機會，而弟之敢辦這個性質的半月刊，也就是因為有燕大研究院生的學力作後盾；這半月刊的進展，也就是研究院生的學力的進展。」¹⁵

期刊使年輕人學術成果的及時發表有了制度性的媒介，他們有了展示自己才華的最好機會。對一個初學者而言，如果其作品能夠發表在具有公信力的學術期刊上，往往有很大的激勵作用。羅爾綱在寫完《上太平軍書的黃畹考》以後，經過與胡適多次反覆討論，胡適才允許其發表在《國學季刊》上，平添了他日後繼續研究的勇氣。而1936年夏，羅爾綱在《益世報·史學》中以筆名「幼梧」發表《金石萃編唐碑補訂偶記》，胡適鼓勵他把「此項金石補訂筆記之最工者，陸續送給《國學季刊》發表，用真姓名。此項文字可以給你一個學術的地位，故應用真名」¹⁶胡適的這句話表明其對於文章的「發表」這一社會行為的理解相當透澈。正如劉龍心所言，「閉門著述，藏諸名山的時代逐漸過去，民初學人已十分懂得如何藉由發表此一行為表現成績。」¹⁷

一大批青年才俊，通過發表論文，更多地出現在民國學術界的學術視野當中，使學界對他們產生了初步的印象，論文成為最直觀的敲門磚。1935年秋，羅爾綱在《益世報·史學》上發表了一篇〈淮軍的興起〉，指出淮軍「為曾國藩濟湘軍之窮，彌縫他本人無限之缺憾而假李

鴻章之手來創立的」。就引起了當時清華文學史學系當時的主任蔣庭黼的注意，認為是「發前人所未發，言前人所未言的真相」。於是請吳晗幫助約見羅爾綱。並在第二年春出任駐蘇聯大使時，推薦羅爾綱接任其在清華所開設的中國近代史課程。¹⁸與以前相比，學術的「發表」行為使年輕人被埋沒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反而年少即享有盛名，期刊對此功不可沒。

侯仁之晚年回憶：《禹貢》半月刊創刊時，他正在燕大讀大學二年級，顧頡剛讓他寫一篇習作，題為〈漢書地理志中所釋之職方山川澤〉，成稿以後，能否發表，當時並無信心，但「出乎意料的是這樣一篇習作，很快就在《禹貢》半月刊上登載出來。尤其使我驚異的是這篇文章的緒論和結語，都經過了頡剛老師的修改、補充和潤飾，竟使我難於辨認是我自己寫作的了。這件事大大激勵了我，我決心去鑽研古籍，就是從這時開始的。」¹⁹1981年，楊向奎評價道，《禹貢》「造就了許多人，現在歷史地理學中的大家名家全是那是出來的。」²⁰文章的發表不僅可以宣揚學術觀念，交流學習心得，表現學術成果，更可建立作者自身的學術聲望。比之前人，個人的研究成果得以更快的速度傳播，學者得到社會認識的機會大大增強。

三 學術如何表述

賀昌群認為「論文」是由「札記」一類的文字演變而來。²¹艾爾曼也提出，18世紀考據學通行的研究方式是札記體著作，他本身既是清代學者重要的著述形式，又可被視為供其他學者引用的資料性著作。而宋明理學家的多數作品是抽象思辨的記錄，他們大多採用問答、格言、辯論、詩歌等著述形式。²²而到了趙翼時期，其治學方式已經與18世紀乾嘉時代通行的史學方法不一樣而「獨創一格」了，即「創出將正史分成若干小題來研究的方法」。²³

這一說法也得到後來者呼應。李弘祺就認為，傳統中國人治學從筆記的短篇記述或考證而逐漸發展出撰寫長篇札記的方法，「在清朝時用以治經考史，竟然能演化成一種簡單而實用的歸納法。後來因為合數篇考證而使一些史家能開始作有系統的尋繹歷史演變的通則，寫成長篇探討制度、風俗、文物的作品」。尤其是趙翼等人的「札記」，其「長處便在於能把論點作有條理的表達與敘述，而其敘述的本身便是舉證」，已接近於後來的「學術論文」體。這樣的寫作方法為晚清以來中國史家所熟悉，因此才能「大致承受得了近代西洋史學之衝擊」。從章太炎的《官制索隱》到王國維、羅振玉的古史著述，再到顧頡剛關於古史「層累堆積說」的表述，中國學者進而接受現代西方史學的寫作方法，正是「很自然的演變」。²⁴

賀昌群在1943年就認為「我國學術文字最初具有論文形式的，似以光緒三十一年（1903年）創刊的《國粹學報》中所載為最早」。²⁵齊思和在1949年同樣將學術論文與期刊雜誌的興起聯繫起來相考察，「民國以來的史學大師如王國維、陳寅恪、顧頡剛、郭沫若等先生，他們的研績俱是以專題論文的方式發表出來的，除了他們的作品之外，無數的專題論文，在學術雜誌中發表，成了我們現代史學的基礎。這種風氣經幾位大師的提倡，和西洋前例的引導，到了民國十年以後，專門的學術雜誌便紛紛的出現了。」²⁶

「學術論文」在學術界確立地位的特別重要的一個因素是高校開始紛紛開設論文的指導課程以及將論文規定為學生必須完成的任務。早在1920年代，北大的課程即包括教授學生如何寫作學術論文，近年在巴黎圖書館所發現的早期的北大講義中，就包括「學術文習作示例」，當時，許多著名學者的文章，如王國維、梁啟超、胡適等的文章，就經常被用作課堂上的示

例，而且當時在學術論文寫作的體例、方法、技巧等問題上都形成了一定的理論。²⁷

同一時期，燕京大學歷史系也已經開始設立史學方法與史學練習等課程，當時這些課的主講者為洪業，從其所列的授課大綱中可以看出，這些課程主要以訓練學生在研究上的操作技巧為目的，即學生如何將其所學表述出來。在史學方法課上，洪業先把講授重點放在史料的如何尋檢，記錄，批評及報告，再提出淺近的問題供學生們練習。在史學練習一課上繼續注重「書籍文稿之校讎及訂定」，以及題跋和短篇考證論文的習作。而在更進一步的史學方法課程上，洪業則更進一步細論撰寫畢業論文的種種，如「選題之標準，考證之程式，解釋之理論及編纂之格式」等等，可謂對學生撰寫「學術論文」進行系統的指導。²⁸當時就讀燕京大學歷史系的周一良回憶：洪業於課堂上經常強調「引書必須忠於原文，引用前人說法和材料必須注明出處，盡量追溯第一手史料」等基本概念，並要求學生必須按照他課堂講授的方法試寫論文，確實使他獲得「極有益的訓練」。²⁹這也可以在其他記錄中得到驗證，《學府紀聞——私立燕京大學》記錄：「洪師撰有『研究論文格式舉要』一冊，凡主修歷史系，又選修歷史方法者，莫不同受其益，其對於日後諸生撰作畢業論文與一般學術論著，裨益殊多。至今坊間類此指導學子撰作研究論文之專著，尚無堪與之抗衡者。」³⁰

當時，對於論文的撰寫也有硬性要求，不只是研究所的學生必須撰寫畢業論文，許多學校也要求大學四年級的學生必須完成畢業論文之後才能畢業。在燕京大學歷史系，多數學生在三年級下半學期開始就分頭找導師，商量自己的論文題目。因此，燕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生通常有足足一年半的時間中都要用在論文的寫作之上。他們的畢業論文大多水準都比較高，其中特別優秀的就發表在《史學年報》上。而清華國學研究院在學生入學之初就規定學生畢業要有學術論文，要求「學生於報考時，即須認定學科範圍」，入學後則以報考時的範圍與教授商定「專修題目」，因此學生到校後通常很快就會擬出自己的研究題目，並在一至兩年的時間裏完成論文。³¹

對於論文，清華十分強調規範性。其《學生畢業論文細則》中詳細注明了學生畢業論文中必須遵守的格式。其中「乙、論文中引用句出處，須注明著者，書名，版本，出版處及頁數。」「丙、論文之末，須表列所用參考書，列明著者，書名，版本，出版處。」³²而此時正在清華上課的陳寅恪對論文的見解則是宏觀的，他強調的是材料與結論的新穎性，如果資料與見解都沒有什麼可取的，則做論文也沒有什麼益處。³³青年學生在大學期間受到了嚴格的論文寫作訓練並把這種風氣普及於整個學術界，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文章越來越規範，1934年，賀昌群已經認為論文體裁「愈演進，組織愈謹嚴、愈深刻」了。³⁴到了1943年，他更是斷言「今日中國的歷史學是一個論文寫作或專題研究的時代。」³⁵

然而，正是源於規範化、標準化的要求，學術論文要公開發表並接受評價，作者總是盡可能將個人的色彩減到最少，進而強調最為客觀的研究。加之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更多的介入到文章之中，新史家們應用現代意識和所謂科學的方法，以學術論文為載體，在幾千年來累積成的浩如煙海的舊史料中透過一番新的洗禮，重新估價每個時代的每件事情，而給予一種至少在現代認為正確的意義和解釋。梁啟超的那種「筆鋒常帶感情」的寫法已經過時了，代之以純粹「客觀化」的表述，歷史研究的「詩性之美」在學術論文這種規範化的形式下得到最大程度的削弱。

期刊上的「學術論文」已經成為一個人學力的直觀衡量。1933年11月，陳寅恪致函傅斯年，

鄭重推薦即將回國的張蔭麟進入史語所或北京大學史學系，謂：「張君惟清華近年學生品學俱佳者中之第一人，……所著述之學術論文多為考證中國史性質，大抵散見於《燕京學報》等。」³⁶顧頡剛在致胡適的一封信中透出他對譚其驤十分欣賞，「看《禹貢》半月刊，《史學年報》，《燕京學報》諸刊物所載可知，他在燕大研究院畢業生中應列第一。」³⁷此外，論文更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學術水準的參考，「在學術的陣地上，論文是最前鋒的，一種或一國的學術的進步，單看那論文的內容所達到的深淺，便可知道。」³⁸

「學術論文」這種述學文體的產生，也反映了近代史學研究風氣的轉移。論文往往是專題研究，陷於篇幅，往往選擇一個具體的問題，憑藉第一手資料，常有所創見，這種問題取向的、窄而深的研究，與傳統學人十分強調的「貴通人不貴專家」的觀念相當不同。同時，相對於專著，「論文」這種體裁對作者學術功底的要求相對較低，且因篇幅短小，學術生產的周期縮短，發表文章甚至可以成為成名的捷徑，此點對青年學生尤其具有號召力。賀昌群就說過，「著書難免雜湊，論文便不必雜湊，不當雜湊了。一個求知欲極熾而又極沉潛的人，無論學自然科學或文化學科，我想大概不願耗費他的時間去寫一部至少一二十萬字的著作（把他一點一滴得到的結果整理而成一部著作的，當然例外）。」而且，對於論文作者而言，「他僅須較短的時間將他研究的成果點點滴滴的報告出來，學術的新領地的開拓，是要有這些前驅者才能擴大的。」³⁹「學術論文」已經開始主導民國史學的發展走向了。

四 學術與時代的脫節——走向專門之路

史學期刊雖然在二三十年代大量興起，但是對於期刊這種形式的存在很早就存有爭議，如何處理思想、學術與期刊雜誌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個問題。王國維很早就指出：「庚辛以還，各種雜誌接踵而起。其執筆者，非喜事之學生則亡命之逋臣也。此等之雜誌，本不知學問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雖時有學術上之議論，不但剽竊滅裂而已。」⁴⁰熊十力在1920年也注意到，「今日優秀之才，多從事於雜誌；以東鱗西爪之學說鼓舞青年，對於精深之學術，不能澄思渺慮，為有系統之研究。默觀今日各校學生，每日除照例上課外，人人讀雜誌，人人做雜誌（此舉大數言，不能說無例外）。長此不改，將永遠有絕學之憂。」⁴¹到了30年代，張爾田更是斷言「真學問必不能於學校中求，真著述亦必不能於雜誌中求。」⁴²

此種觀念具體的實踐可以清華國學研究院為例，在其開辦之初，吳宓與研究院內導師原意都不主張辦刊，而是希望學生應專心研究，不要把心思過多用在刊物的撰述與編輯上。清華國學研究院在第一次教務會議上有《本院不刊發雜誌》的決議。（1）雜誌按期出版，內容材料難得精，若以照片祝辭等充塞敷衍，於本院聲明有損無益；（2）學生研究年限，暫定一年，研究時間已苦無多，若再分心於雜誌之著述及編輯，必荒學業；（3）佳作可刊入叢書，短篇可於《週刊》及《學報》中分別刊登。⁴³然而劉盼遂，吳其昌等學生卻一再要求吳宓允其出版定期刊物，「以表現成績而資宣傳」。後吳宓耐不住學生的要求，辦起了《國學論叢》，作為師生發表的園地。⁴⁴

不管是王國維還是吳宓、張爾田，都將雜誌定位於社會思想的鼓動者，在他們眼中，雜誌只是一種政治工具，一種通俗讀物，甚至將雜誌與真學問對立起來。而正是這些言論也從另外一個側面揭示了當時雜誌對於思想普及的巨大威力。⁴⁵

然而，新興的專門性學術期刊已與一般雜誌不同，其反映的是平穩、冷靜和理智的風格，尤其在30年代上半期，以胡適、傅斯年為代表的專尚考據的一派躍居民國學術主流，北平的學術界裏甚至充滿著「非考據不足以言學術」的空氣。⁴⁶在各種文史類主流刊物上發表的論文自然大多數更是有關某個史實、某種典制、某類金石器物或某個文字的考證。這些文字深奧難懂，文章的讀者群被限制在一個非常小的範圍之內，學術不再負有傳播思想的責任而走向純粹專業化、學院化，史學不再注意自身的社會功能。這種情形表明在五四時代各種思想競相傳播的激流過後，知識界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對於具體學術問題的探討，反映出學界風氣向純粹學術的回歸。

從根本上說，胡適、傅斯年這一代史家的這種學術取向與他們對史學功能的認識息息相關。他們希望歷史不要成為道德教訓的工具，不要讓仁義道德干擾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同時也要把歷史與現實政治的關係切斷。⁴⁷雖然在30年代中後期，隨著國難危機逐漸逼近，傅斯年等人重新思考史學的社會功能並有所嘗試，一些專業史學團體也開始與報紙合作，在《大公報》、《益世報》、《中央日報》等報刊上開闢通俗性的史學副刊，力圖喚起國人的危機意識，但史學研究的純學術化趨勢似乎不可逆轉。

民國時期，大學，研究機構與期刊常常三位一體，學人越來越多地將研究成果發表於期刊而非報紙或是一般文化性刊物上。學術期刊的發行範圍只是學術設群，發表的論文自然不再注意一般讀者，不考慮對群眾的影響。1926年1月1日，顧頡剛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寫作了〈一九二六年始刊詞〉，其中的主要內容即為「我們研究的目的，只是要說明一件事實，絕不是要把研究的結果送與社會應用」，「我們得到的結果也許可以致用，但這是我們的意外收穫，而不是我們研究時的目的」，「這種的斟酌取擇原是政治家、社會改造家、教育家的事情，而不是我們的事情」。1929年2月顧頡剛為《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年報》第六集撰寫的序文中，仍然強調「專門的學問是不必普及的」，但要爭取「一般人的最小限度的諒解」。正如錢穆後來總結的那樣，民國學術與時代逐漸脫節，「此數十年來，國內思想潮流及一切實務推進，其事乃操縱於報章與雜誌期刊。大學講堂以及研究院，作高深學術探討者，皆不能有領導思想之力量，並亦無此抱負」。⁴⁸嚴謹的學術期刊與一般的社會雜誌由於面向不同的讀者群，因此而有了一個逐漸疏離並最終確立二者邊界的過程，學術也開始回歸其象牙塔的原位，不再負有引領社會風氣的作用。正是這種有意識的區分突出了學術刊物在學術發展中的媒介角色，也使得它的功能更加純粹與單一。

在學術史的視野內，近代由經入史，史學處於民國學術的核心地位；而將目光投注整個社會，從致用的角度出發，是新興社會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的天下。⁴⁹史學在確立自身學科專業化的同時，與社會、時代的脫節趨勢愈加明顯，這雖是史學發展所必須，然亦把自身推向困境。正是史學的自身定位日益專門，不能表現出它對社會的立即價值，尤其是進入戰爭狀態之後，純正的史學研究早已不是國家的必需，在此種局面之下，史學被迫退居邊緣的命運也就可以想見了。

* 本文所論述的史學期刊主要以專門發表史學文章的刊物為中心，但二三十年代史學並非獨立的學科，其與地理學、語言學等雖有逐漸疏離的傾向，卻仍存在著緊密的聯繫，史學與這些學科常合為一刊。此外，當時在一些綜合類的刊物以及大學學報中，史學內容通常也佔據最大的分量，故本文將這些刊物都放在討論視野之內，不過，所要重點論述的仍是專門以史學為獨立內容的專門性史學期刊。

註釋

- 1 閔傑：《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0頁。此說不一定準確，在此只是為了說明學術期刊的萌芽形式出現的較早。
- 2 賀昌群在1943年提到「中國新史學的基礎，如果從北京大學出版的《國學季刊》創刊算起，至今還不到二十年」。參見〈哀張蔭麟先生〉573-576頁，《賀昌群文集》第三卷「文論及其他」，商務印書館，2003年。
- 3 胡適列舉的十個方面為：民族史、語言文字史、政治史、國際交通史、經濟史、思想學術史、宗教史、民俗史、文藝史、制度史。見《國學季刊》第1卷1號，1923年1月。
- 4 齊思和文中所列雖有遺漏，但基本上涵蓋了民國時期有影響的史學期刊。參見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燕京社會科學》，第二卷，燕京大學法學院出版，1949年。
- 5 張春樹：《民國史學與新宋學——紀念鄧恭三先生並重溫其史學》，載《國學研究》第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8頁。
- 6 王汎森：《汪悔翁與〈乙丙日記〉——兼論清季歷史的潛流》，收入其《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年，第63頁。
- 7 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趙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9—140頁。
- 8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下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633-634頁。
- 9 陳以愛：《學術與時代：整理國故運動的興起、發展與流行》，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2年，第11頁。
- 10 王學典、孫延傑著《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年，第181-182頁。
- 11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台灣遠流出版公司，2002年，370頁。
- 12 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夏承燾集》第5冊，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頁69，135。
- 13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三聯書店，1998年，第184頁，158頁。
- 14 劉龍心：《學術與時代》，第370頁。
- 15 參見顧潮：《顧頡剛先生對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貢獻》，燕京研究院編：《燕京學報》新十二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72頁。
- 16 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增訂本），三聯書店，1998年，第49頁。余英時也注意到了這一點，見其《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收入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三聯書店，2005年，第152頁。
- 17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第370頁。
- 18 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第57頁。
- 19 侯仁之：〈回憶與希望〉，《歷史地理》創刊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20 楊向奎：〈回憶《禹貢》〉，《歷史地理》創刊號，1981年。
- 21 賀昌群：〈一個對比〉，《賀昌群文集》第三卷，「文論及其他」，商務印書館2003，第544頁。
- 22 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趙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第121頁。
- 23 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
- 24 李弘祺：《泛論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與意義》，收其《讀史的樂趣》，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1，第213-224頁。雖然趙翼等人的「劄記」已經接近「論文」這種文體，但梁啟超回憶他

- 1890年在廣東學海堂的學生生活時，記得每一位學生都備有一本劄記冊子，記錄讀書心得。而清代學者都十分推崇札記體，用以記錄偶爾碰到、讀到乃至聽到的有價值的史料。清代考據學者也運用札記冊子，收集與有關選題相關的史料。至少在此時，學術論文還沒有普遍流行。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第51頁。
- 25 賀昌群：〈一個對比〉，《賀昌群文集》第三卷，第544頁。
- 26 齊思和：《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
- 27 參見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在巴黎邂逅『老北大』」部分，第280-291頁。
- 28 以上所見北平私立燕京大學：《北平私立燕京大學一覽》（民國26-27年度），無出版者，第107-108頁。
- 29 周一良：《紀念陳寅恪先生》，張傑、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第158頁。
- 30 《學府紀聞——私立燕京大學》，台灣南京出版有限公司，民國71年，第123頁。當時，何炳松寫作了兩篇同名的《歷史研究法》，其中都對論文的寫作格式與方法進行了非常細緻的說明，二文分別收入劉寅生、房鑫亮編：《何炳松文集》，商務印書館1997。見第二卷第240-264頁，第四卷第62-70頁。
- 31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台灣遠流出版公司2002，第358頁。
- 32 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國立清華大學時期（1928-1937）》，第2卷，上冊，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第194頁。
- 33 羅香林：〈回憶陳寅恪師〉，見《追憶陳寅恪》，第105頁。
- 34 賀昌群：〈一個對比〉，《賀昌群文集》第三卷，第544頁。
- 35 賀昌群：〈哀張蔭麟先生〉，《賀昌群文集》第三卷「文論及其他」，商務印書館2003，第574頁。
- 36 陳美延編：《陳寅恪集、書信集》，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2001，第47頁。
- 37 顧頡剛致胡適信，1934年9月25日。參見王學典、孫延傑著：《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第172頁。
- 38 賀昌群：〈一個對比〉，《賀昌群文集》第三卷，第544頁。
- 39 賀昌群：〈一個對比〉，《賀昌群文集》，第544頁。
- 40 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王國維遺書》第5冊，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影印本，第95頁。
- 41 〈熊子真致蔡元培〉，《新潮》2卷4號（1920年5月），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本，828頁。
- 42 夏承燾：《夏承燾集》第5冊，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27頁。
- 43 孫敦恒：《吳宓與清華國學研究院》，收入李賦寧等編《第一屆吳宓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2頁。
- 44 《吳宓日記》第3冊，三聯書店，1998年，第85頁。
- 45 陳以愛就觀察到，近代印刷術傳入中國後，引起了出版業的革新。各種新發行的報刊、雜誌、書籍、小冊子皆以知識界為傾銷物件，導致觀念傳播的方式和速度均大異於前。參見其《學術與時代》，第10頁。
- 46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三聯書店，1998年，第171頁。
- 47 詳細內容見傅斯年著名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
- 48 錢穆：《〈新亞學報〉發刊詞》，《新亞學報》第1期，1955年8月。轉引自桑兵：《晚清民國

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頁。

- 49 洪業就曾指出「諸位知道：歷史的內容，向來注意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從前的人若要做點閱世知人、治國經邦之學，就要讀歷史。近代的局面，有點變了。要升官的，就修政治學；要發財的，就修經濟學；要在社會活動的，就修社會學。諸如此類的學術，從前只是歷史的支派。現在兒女各自成家，有時竟使歷史被視若老朽，大有日暮途窮的狀況了。」參見洪業：《歷史在近代學術中之位置》，原載《師大月刊》第二十六期，1936年4月30日，收入《洪業論學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192頁。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九期 2007年2月28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九期（2007年2月28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